

中美贸易与美国众议院限制贸易 候选议员的选民支持

车 翼 吕金秋 张 燕*

摘 要: 中美贸易问题是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议题之一,也是美国候选议员拉抬选情的关键工具。本文基于美国贸易法案投票和政治捐赠数据,发现贸易冲击显著提高了美国众议院限制贸易候选人的得票率、胜选率以及其与支持贸易候选人的得票差。本文进一步采取断点回归,发现限制贸易候选人当选后更加反对自由贸易法案而支持再分配法案。最后,本文发现美国政府转移支付政策的实施有助于减少选民对于限制贸易候选人的支持。

关键词: 中美贸易;限制贸易;得票率

DOI: 10.13821/j.cnki.ceq.2026.04.16

一、引 言

中美两国在经贸领域密切互补、利益交融,随着中美两国间贸易总额逐年攀升,贸易摩擦也日益频繁,两国经贸关系甚至逐步走向“政治化”。如今正处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论是特朗普政府发动的贸易战还是拜登政府的对华经贸施压,都充分说明中美贸易问题是两国间的重要议题。国际贸易使得各国专注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促进国际分工的合理化,因此美国通过与中国的双边贸易也有效地改善了其社会福利(Feenstra and Weinstein, 2017)。然而,经济全球化并未在各国内部形成有效的财富均衡分配机制,特别是不利于发达国家的中下层(Barro, 2000;谢丹阳和程坤,2017)。因此,中国经济崛起引发美国的进口竞争,在改善美国总体福利的同时,可能损害了美国国内处于比较劣势行业的从业者利益。一些文献将美国大量劳动者失业归咎于中国出口

* 车翼,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吕金秋,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张燕,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通信作者及地址:吕金秋,上海市徐汇区华山路 1954 号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200030;电话:18271392762;E-mail: lj_q_sjtu@sjtu.edu.cn。车翼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2573057、72073095)、上海市东方英才计划拔尖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以及华东理工大学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的支持。张燕感谢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25YJA790086)的支持。本文得到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专项(24ZDA026)的资助。

冲击(Autor et al., 2013),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思潮开始迅速抬头。

由于年龄、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的限制,美国失业工人难以快速再就业,进而倾向于在政治选举中积极地表达利益诉求,寻求抵制自由贸易的途径(Margalit, 2011)。尽管国会议员的意识形态相对稳定,但由于选民对因国际贸易带来的失业极其敏感,所以迫于选票压力,他们可能采取更具贸易保护主义的策略性态度以回应选民的利益诉求(Margalit, 2011; Feigenbaum and Hall, 2015)。现有文献主要集中于中国进口竞争如何影响美国劳动力市场(Pierce and Schott, 2016; Feenstra et al., 2019)、婚姻市场(Autor et al., 2019)、技术创新(Autor et al., 2020)等,鲜有从候选议员贸易倾向的角度考察进口竞争对美国政治选举的影响。故本文综合考虑候选议员的贸易态度和政治选举结果,严谨考察中国贸易冲击如何影响美国众议院限制贸易候选人的选民支持力度,并进一步分析其胜选后对于贸易法案和再分配法案的投票行为,极大地填补了相关文献的空白,并据此为我国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建言献策。

具体而言,本文参考 Bonica(2014)和 Hall and Snyder Jr.(2015),采用贸易法案投票及政治捐赠数据构造出众议院候选人的贸易倾向指数,并据此准确判断出每个选区内的限制贸易候选人作为样本^①。针对中国对美国的贸易冲击,本文采用地区产业结构的差异和美国从中国进口的数据构造出美国各选区的贸易冲击指数,指数越大代表该选区受到中国产品进口的冲击越大。考虑到可能存在的遗漏变量、反向因果等内生性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还根据八个其他高收入国家进口数据构建对应的工具变量。基于上述处理,本文采用2SLS法严谨评估了来自中国的贸易冲击如何影响美国众议院限制贸易候选人的选民支持。

实证结果显示:中国贸易冲击显著提高了美国众议院限制贸易候选人的选民支持,表明在贸易冲击下,美国选民对自由贸易的态度较为负面,该结果与 Margalit(2019)一致。稳健性检验从替换因变量和贸易冲击指数的衡量、考虑重新划分选区及根据动态贸易倾向指数重新判定限制贸易候选人样本等方面进行了检验,实证结果依旧保持稳健。本文还发现在贸易冲击下,限制贸易候选人的胜选率提高,其与支持贸易候选人的选民支持差距进一步扩大。本文对基准结果进一步讨论,采用断点回归发现相对于支持贸易候选人而言,限制贸易候选人当选后更倾向于反对自由贸易法案和支持再分配法案,该投票行为一

^① Che et al.(2022)认为民主党更加反对自由贸易,但2016年当选的特朗普属于共和党,其上任后采取如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重启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条款谈判、发动中美贸易战等反对自由贸易的政策,显然属于限制贸易候选人,因此单纯按照党派判断议员的贸易态度存在估计误差。本文通过构造贸易倾向指数能够精准衡量议员对待贸易的态度,减少了估计误差。

定程度上回应了因自由贸易受损的选民诉求。最后,本文发现政府转移支付对因国际贸易冲击失业的劳动者再就业有所帮助,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候选人的选举压力从而放弃采取策略性限制贸易的态度,因此该政策的实施有助于议员站在选区长远利益的角度制定支持自由贸易的政策。

本文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作出的贡献如下:第一,以往文献(Bonica, 2013; Bonica, 2014; Hall and Snyder Jr., 2015; Autor et al., 2020)主要利用 DW-NOMINATE、DIME 等意识形态数据库^①来研究候选人的贸易倾向,但意识形态包含核武器等诸多无关因素,并不能完全反映候选人的贸易倾向。基于 Feigenbaum and Hall(2015)采用美国众议院点名投票数据衡量意识形态的方法,本文参考 Bonica(2014)和 Hall and Snyder Jr.(2015)采用贸易法案投票、政治捐献数据精准衡量众议院候选人的贸易倾向指数,填补了衡量议员特别是落选议员贸易倾向的文献空白。第二,与王孝松(2017)、Che et al.(2022)等文献不同,本文根据构造出的贸易倾向指数精准判断选区内限制贸易候选人和支持贸易候选人,不再单纯从党派的视角判断议员的贸易倾向,极大地减少了估计误差。第三,本文考察贸易冲击下限制贸易候选人的选民支持度,并评估胜选后限制贸易议员对贸易法案和再分配法案的投票行为。区别于现有文献(Margalit, 2011; Che and Xiao, 2020),不再仅限于考虑贸易冲击对政治选举或法案投票的影响,而是综合考虑了候选人的贸易倾向及其政治选举和胜选后的投票行为,有力地丰富了贸易冲击、贸易倾向、政治选举投票三者相关的文献(Autor et al., 2020; Choi et al., 2024)。第四,本文引入贸易调整援助计划,发现政府转移支付有利于实现贸易公平,亦可减轻竞选候选人的选举压力,从而制定出符合社会总体福利、助力经济发展的贸易政策。这一发现不仅为中美两国,也为其他国家促进贸易公平提供了有益的解决思路。

二、变量及数据

(一) 变量构建

1. 贸易倾向指数

本文首先构造出贸易倾向指数以判断每个选区相对反对自由贸易的候选议员,构造方法如下:参考 Comparative Agendas 数据库^②对美国议案的分类,

^① DW-NOMINATE 数据库主要用于美国国会议员、政党和政治机构等意识形态的研究,接近 1 的评分被认为是保守派,接近 -1 被认为是自由派,零点附近被认为是温和派。DIME 数据库主要用于研究美国政治中的竞选资金与意识形态,收录了各种来源的捐款记录、候选人特征及选举结果。

^② Comparative Agendas 数据库研究不同时期及不同国家间的政策制定过程,每个条目均被归入 21 个主要主题和 220 个子主题之一。

选出子主题贸易协定(序号:1802)和关税与进口(序号:1807)^①所包含的所有贸易法案,同时我们只关注最终法案从而去除了程序性和不直接处理贸易限制问题的法案,接着通过反复人工阅读判断该贸易法案是否属于支持自由贸易的法案,最后构造出议员的固定贸易倾向指数。参照 Hall and Snyder Jr.(2015),具体公式如下:

$$IncumTRI_i = \frac{\sum_b Vote_{ib} \times BillType_b}{\sum_b |Vote_{ib}|}, \quad (1)$$

其中, $IncumTRI_i$ 表示议员 i 在样本期内的固定贸易倾向指数, $Vote_{ib}$ 表示议员 i 在样本期内对贸易法案 b 的投票结果,赞成 1,反对 -1。 $BillType_b$ 表示贸易法案 b 的类型,若为支持自由贸易的法案,则为 1,否则为 -1。分母表示该议员在样本期内投票次数的总和。故式(1)构造出的议员 i 的贸易倾向指数取值处于 -1 到 1 之间, -1 表示议员极度反对自由贸易, 1 表示议员完全支持自由贸易。相较于意识形态对众议员开放、保守态度的刻画,固定贸易倾向指数通过议员实际对贸易法案投票结果的统计更能有效反映议员真实的贸易态度。

但是,仅有胜出的议员才可对贸易法案投票,故上述数据构造出的贸易倾向指数样本仅包含胜选的议员,对于在众议院选举中的落败候选人,本文采用 Bonica DIME(2023)数据库中候选议员在竞选中收到的捐款数据,参考 Hall and Snyder Jr.(2015)的做法,计算出捐赠者的贸易倾向指数。根据 Bonica (2014),捐赠者的贸易倾向指数在短期内相对稳定,故在计算捐赠者的贸易倾向指数时,将其视为常数,相关具体推算公式如下:

$$DonorTRI_l = \frac{\sum_i IncumTRI_i \times Contribution_{il}}{\sum_i Contribution_{il}}, \quad (2)$$

其中, $DonorTRI_l$ 表示捐赠者 l 的贸易倾向指数, $IncumTRI_i$ 表示依据式(1)计算出的议员 i 在样本期内的固定贸易倾向指数, $Contribution_{il}$ 表示的是捐赠者 l 在样本期内对议员 i 的捐赠金额,分母表示的是捐赠者 l 对所有议员捐赠金额的加总。故式(2)捐赠者 l 的贸易倾向指数是通过将捐赠者 l 对每个议员 i 捐赠比例作为权重,对所有议员 i 贸易倾向指数加权所得。

在式(2)得到捐赠者 l 的贸易倾向指数后,我们将进一步通过捐赠者款项去向计算候选人的固定贸易倾向指数,构造方法如下:

^① 本文采用的主题是外国贸易(序号:18),其中子主题贸易协定(序号:1802)涵盖与贸易谈判、争端及协定相关的法案,包括税收协定;关税与进口(序号:1807)涵盖与关税及其他进口壁垒、进口监管以及进口对国内产业的影响相关的法案。

$$CandidateTRI_i = \frac{\sum_l DonorTRI_l \times Contribution_{il}}{\sum_l Contribution_{il}}, \quad (3)$$

其中, $CandidateTRI_i$ 表示候选人 i 在样本期内的固定贸易倾向指数, $DonorTRI_l$ 是式(2)所得的捐赠者 l 的贸易倾向指数, $Contribution_{il}$ 表示的是捐赠者 l 在样本期内对议员 i 的捐赠金额, 分母是候选人 i 在样本期内收到所有的捐赠金额加总。通过将每个捐赠者 l 在样本期内的捐赠金额占比作为权重, 加权捐赠者 l 的贸易倾向指数, 从而得到所有候选人的固定贸易倾向指数。后续计量过程, 为保持一致性, 统一采用式(3)计算出的固定贸易倾向指数。

2. 贸易冲击指数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中国的贸易冲击, 参照 Autor et al.(2013)的做法, 本文构造贸易冲击指数的方法如下:

$$Exposure_{dt} = \sum_j \frac{L_{jdt}}{L_{jt}} \times \frac{Import_{jt}^{cu}}{L_{dt}}, \quad (4)$$

其中, $Exposure_{dt}$ 表示的是选区 d 在 t 年受到的贸易冲击指数。 L_{jdt} 表示选区 d 在 t 年行业 j 的劳动人口, L_{jt} 表示在 t 年行业 j 的总劳动人口, 故 $\frac{L_{jdt}}{L_{jt}}$ 表示 t 年选区 d 在行业 j 的劳动人口占比。 $Import_{jt}^{cu}$ 表示的是美国在 t 年从中国进口行业 j 商品的进口总额, L_{dt} 表示 t 年选区 d 的总人口。式(4)表明, 贸易冲击指数越大, 该选区 d 在 t 年的产业结构与中国进口品类越相似, 则受到中国贸易的冲击越大。

式(4)假设中国出口的快速增加很大程度上是由改革开放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贸易成本降低所致, 对美国市场而言属于外生的供给冲击, 而非内生需求所驱动。但这一设定可能存在遗漏变量、反向因果等内生性问题的影响, 故本文参考 Autor et al.(2013)采用中国对八个高收入国家的出口量构造贸易冲击指数的工具变量 $IVExposure_{dt}$ 。因为高收入国家从中国进口的增长仅代表中国产品供应的提升, 与美国从中国的进口相关, 但不与美国候选议员的得票率有关。具体的构造方式为将式(4)中的 $Import_{jt}^{cu}$ 替换为 t 年中国出口到八个高收入国家行业 j 的商品总额。八个高收入国家分别是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丹麦、芬兰、德国、西班牙和瑞士。为降低极值的影响, 下述回归中贸易冲击指数均加 1 取自然对数。

(二)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美国政治选举可分为总统选举、参议院选举和众议院选举, 其中众议院选举每 2 年进行一次全面选举, 相较于参议院议员任期 6 年, 每 2 年改选 1/3 而言, 众议院候选人选举竞争压力相对更大, 对选民的诉求更加敏感。众议院共

有435个席位,可供研究的样本量较大,所以据此作为本文的研究样本更能反映出贸易冲击对于美国政治选举的影响。下文中众议院候选人的得票率、是否胜选以及个人特征如党派及性别数据来源于Leip数据库^①和DIME数据库。

本文采用的贸易类法案投票数据来源于Voteview数据库^②:首先按照Comparative Agendas数据库^③对法案主题的划分,选出子主题贸易协定(序号:1802)和关税与进口(序号:1807)所包含的所有贸易法案,同时我们只关注最终法案从而去除了程序性和不直接处理贸易限制问题的法案^④。最终样本中使用的贸易法案如附录I所示,涉及3679个候选人。^⑤由于落选的候选人缺乏参与贸易法案投票的数据,故本文参照Bonica(2014)和Hall and Snyder Jr.(2015),采用候选人的政治选举捐赠数据估计他们的贸易倾向指数。政治选举的捐赠数据来源于Bonica DIME(2023)数据集。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中国对美国的贸易冲击。为了量化中国出口对美国的贸易冲击,本文参照Autor et al.(2013),采用UN Comtrade数据库和美国人口普查局县级层面的工业结构数据,通过将商品名称、编码协调制度(HS)6位编码及美国产业分类标准(NAICS)匹配起来构建贸易冲击指数。除此以外,为了缓解遗漏变量带来的估计偏误,本文还包含了选区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家庭收入中位数、高等教育人口占比(Baldwin and Magee, 2000)、非白人占比、退伍军人占比以及年轻人(18—25岁)占比(Conconi et al., 2012),这部分数据均来源于美国人口普查局。本文最后部分的贸易调整援助计划数据来源于美国劳工部,包含因国际贸易利益受损的每个劳动者的公司以及所在行业,利用美国邮政编码对应将受补贴人数加总到选区水平。

(三) 描述性统计

表1是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包含变量的观测数、均值和标准差。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观测数	均值	标准差
得票率(%)	3 335	45.897	16.553
得票差(%)	3 335	-6.046	33.097

① Leip数据库涵盖州、县及选区层面的美国总统、众议院和参议院选举,以及部分投票站层面的数据。

② Voteview数据库提供美国所有国会点名表决数据,也包含参议员和众议员在投票时的意识形态。

③ 参见<https://www.comparativeagendas.net/pages/master-codebook>,访问时间:2025年8月12日。

④ 据此剔除了如下法案:HR2670, HR3008, HR2682, HR4944, S203, HR3074, HR2638和HR4380。

⑤ 限于篇幅,附录未在正文列示,感兴趣的读者可在《经济学》(季刊)官网(<https://ceq.ccer.pku.edu.cn>)下载。

(续表)

变量名	观测数	均值	标准差
高等教育人口占比(%)	3 335	34.633	7.148
非白人占比(%)	3 335	23.972	14.249
家庭收入中位数	3 335	41.714	8.620
退伍军人占比(%)	3 335	9.631	1.950
年轻人占比(%)	3 335	9.843	1.404
贸易冲击指数	3 335	0.760	0.509
贸易冲击指数(IV)	3 335	0.683	0.460

三、实证策略

(一) 计量模型设定

贸易作为中美最利益攸关的经济往来,是两国政府及经济学家关心的重要议题。本文利用 1992—2010 年美国众议员投票数据,定量分析中美贸易冲击是否影响美国选民对限制贸易候选人的支持力度。若限制贸易候选人因此当选的概率增加,则可以为当前的贸易保护政策提供理论基础并为将来的贸易政策优化提供证据。本文的基准模型设定如下:

$$Y_{idt} = \beta Exposure_{dt} + X'_{dt}\gamma + \delta_s + \eta_t + \epsilon_{idt}, \quad (5)$$

其中, Y_{idt} 代表 t 年选区 d 两位候选人中根据贸易倾向指数判断更加反对贸易自由化的候选人 i 的得票率。 $Exposure_{dt}$ 表示 t 年选区 d 受到来自中国进口的贸易冲击指数。为了缓解遗漏变量偏误的干扰,模型中还加入相关控制变量 X'_{dt} , 具体为 t 年选区 d 的高等教育人口占比、非白人占比、家庭收入中位数、退伍军人占比以及年轻人占比(Baldwin and Magee, 2000; Conconi et al., 2012),用以控制选区能够影响选票的重要特征。 δ_s 表示州层面的固定效应,用以控制不随时间变化的所有州特征; η_t 表示年份固定效应,用以控制影响各选区的时间趋势。 ϵ_{idt} 为随机扰动项,表示不被观测到的相关变量。参考 Conconi et al.(2012)在贸易-政治方面的研究,我们将标准差聚类在州-年份水平。

(二) 内生性讨论及解决

上述基准模型中,我们假定中国对美国出口大幅增加源于中国改革开放以及 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降低贸易成本所引致的生产率大幅提升,这对于美国而言是外生的供给冲击。但不可忽视的是,在式(5)的基准回归中,我们有以下担忧:首先,美国就业和进口可能与未观测到的产品需求冲击正相关。这

种情况下如果美国行业进口需求大量上升,那么就业和进口会同步增加,上文中构造出的贸易冲击指数也会受到影响。同时,鉴于我们不能穷尽所有影响被解释变量的因素,因此回归方程中可能存在遗漏变量的问题,造成 OLS 估计量有偏、不一致。其次,Autor et al.(2020)表明贸易倾向较高的选区更愿意进口中国商品,这会反向影响中国商品的进口;持贸易保护态度的候选人也可能选择受贸易冲击较大的选区竞选。以上逆向因果问题可能会干扰本文的结果。为了克服上述遗漏变量、逆向因果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我们参考 Autor et al.(2013)的做法,通过八个高收入国家从中国进口数据构造出基准模型中贸易冲击指数的工具变量。由于其他高收入国家与美国距离较远且有自主的行政体系,与美国的国内政治基本毫无关联,因此相关进口不直接影响美国众议院候选人的选举结果,仅代表中国产品在全世界的供应水平上涨。同时该进口增加与美国进口中国产品的源动力皆来自比较优势,因此与中国对美国的贸易冲击正相关。据此,该工具变量相对因变量是可能的外生存在且与内生变量正相关,符合工具变量的基本假设。

在具体实施方面,我们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来进行估计。我们首先通过贸易冲击指数对其工具变量的 OLS 估计得到美国贸易冲击指数的拟合值,然后再根据该拟合值对众议院限制贸易候选人的得票率进行最小二乘法,以消除内生性的影响,得到核心解释变量系数的一致性估计。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应的第一阶段估计方程如下:

$$Exposure_{dt} = \beta_1 IVExposure_{dt} + X'_{dt}\gamma + \delta_s + \eta_t + \varepsilon_{dt}, \quad (6)$$

其中,控制变量 X'_{dt} 与第二阶段回归式(5)相关控制变量一致, $IVExposure_{dt}$ 表示第 t 年选区 d 受到来自中国出口贸易冲击指数的工具变量,根据中国对八个高收入国家出口数据构造所得,用以剥离出 $Exposure_{dt}$ 的相对外生部分。尽管工具变量是解决内生性问题的一种有效方法,但其也需满足相关性条件。若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即工具变量与内生解释变量的相关性不强,会导致用工具变量估计出的结果与真实值相差较大。对此下文会进行弱工具变量检验,主要采用 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量和 Kleibergen-Paap Wald rk F 统计量来判断,若超过 Stock-Yogo weak ID test 给出的 10% 临界值,则说明可以拒绝原假设,认为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其次,本文还进行不可识别检验,方程识别不足的情况下无法得到一致的估计结果。为此本文采用 Kleibergen-Paap rk LM 统计量进行检验,若 p 值小于 0.01 则说明在 1% 水平上拒绝“工具变量识别不足”的原假设。

四、回归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如上文所述，基准回归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所以在此我们采用八个高收入国家数据构造的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检验，以有效缓解内生性问题。表 2 首先汇报了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第一阶段结果。表 2 的被解释变量为贸易冲击指数，第(1)列中仅加入贸易冲击指数的工具变量，可见系数为正，并在 1%水平上显著。第(2)和(3)列在前一列的基础上依次加入年份固定效应、州层面固定效应及选区层面的控制变量，贸易冲击的回归系数依旧显著为正。由于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显著相关并不说明其对内生变量有足够的解释力度，因此采用弱工具变量检验。第(1)—(3)列中 Stock-Yogo weak ID test 10%的临界值为 16.38，Cragg-Donald Wald F、Kleibergen-Paap Wald rk F 值这两个统计量显著大于 10%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所以可以拒绝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对于不可识别假设，表 2 中的 Kleibergen-Paap rk LM 统计量显示 p 值小于 0.01，则表明在 1%水平上可以拒绝“工具变量不可识别”的原假设。综上所述，本文构造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

表 2 基准回归的第一阶段结果(2SLS)

变量名	因变量：贸易冲击指数		
	(1)	(2)	(3)
工具变量	1.066*** (0.008)	1.018*** (0.011)	1.043*** (0.011)
基准控制变量	否	否	是
年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州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观测数	3 335	3 335	3 335
CD Wald F	42 149.19	16 413.93	157 39.82
KP Wald rk F	16 675.91	8 361.49	8 898.14
Stock-Yogo Test	16.38	16.38	16.38
KP rk LM	105.61***	94.16***	72.82***

注：表 2 的因变量为贸易冲击指数，第(1)—(3)列分别逐项加入贸易冲击指数的工具变量、年份固定效应、州层面固定效应及选区层面的控制变量。基准控制变量包含高等教育人口占比、非白人占比、家庭收入中位数、退伍军人占比以及年轻人占比。*、**和*** 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聚类到州-年份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基于工具变量的有效性,本文进一步根据基准模型的设定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考察贸易冲击对美国众议院限制贸易候选人选票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所有回归结果采用聚类到州-年份层面的稳健标准误。表 3 的被解释变量为众议院限制贸易候选人的得票率,第(1)列加入贸易冲击指数、高等教育人口占比和非白人占比以及控制了年份固定效应和州层面的固定效应,贸易冲击的系数为正,且在 1%水平上显著。第(2)—(4)列在第(1)列的基础上加入家庭收入中位数、退伍军人占比、年轻人占比,结果显示贸易冲击指数的回归系数仍然显著为正,表明来自中国出口的贸易冲击,显著提高了美国众议院限制贸易候选人的选票。这一结果意味着受到中国出口贸易冲击更大的选区,美国选民更倾向于支持限制贸易的候选人,也说明美国选民对自由贸易的态度倾向于更为负面。以第(4)列结果为例,一个选区的贸易冲击指数从第 25 到 75 个百分点数(从 0.343 到 1.078)意味着限制贸易的候选议员的选票提高了 3%,以 2010 年为例,这在限制贸易候选人 42.77%的得票率中占比 7.01%,该结果可以改变 26 个选区的获胜人选,属于相当大的影响力。^① 以 1993 年 NAFTA 的众议院投票来看,若将选区的贸易冲击设为样本内最大变化值,且限制贸易候选人胜选后反对自由贸易法案,那么 NAFTA 法案支持和反对票的比例将由 234 : 200 变为 194 : 240,即 NAFTA 将不会被通过(Choi et al., 2024)。类似地,在 2000 年美国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ermanent Normal Trade Relations, PNTR)的法案中,贸易冲击的变化会导致支持票和反对票的比例从 237 : 197 变为 217 : 217,中国 PNTR 地位的法案亦不会通过。总体来看,来自中国的贸易冲击显著提高了美国选民对众议院限制贸易候选人的支持力度。

表 3 基准回归的第二阶段结果(2SLS)

变量名	限制贸易候选人得票率			
	(1)	(2)	(3)	(4)
贸易冲击指数	3.182*** (1.104)	3.179*** (1.099)	4.146*** (1.128)	4.160*** (1.120)
高等教育人口占比	0.061 (0.075)	0.067 (0.076)	0.058 (0.074)	0.079 (0.074)
非白人占比	0.577*** (0.035)	0.575*** (0.035)	0.662*** (0.039)	0.655*** (0.040)

① 在我们的基准回归中,我们发现地区受教育程度对限制贸易候选人的得票率具有正向影响,这似乎与 Autor et al.(2013)关于非技能劳动受贸易冲击影响更大的结论相冲突。一种可能解释是受到贸易冲击影响的非技能劳动者迁移去了其他地区,并未在当地投票,同时限制贸易候选人可能代表了知识分子等群体,进而致使受教育程度与得票率存在虚假关系(Spurious Correlation)。

(续表)

变量名	限制贸易候选人得票率			
	(1)	(2)	(3)	(4)
家庭收入中位数		0.251*** (0.091)	0.286*** (0.091)	0.288*** (0.091)
退伍军人占比			1.009*** (0.265)	1.010*** (0.264)
年轻人占比				0.396** (0.198)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州层面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数	3 335	3 335	3 335	3 335
R ²	0.176	0.177	0.182	0.183

注：表 3 的因变量为众议院限制贸易候选人得票率，第(1)―(4)列加入贸易冲击指数、年份固定效应、州层面固定效应，并逐项加入选区层面的控制变量。*、**和*** 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聚类到州-年份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二) 稳健性分析

本文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第一，考虑采用众议院选举中限制贸易候选人是否胜选的虚拟变量、限制贸易候选人与支持贸易候选人得票差替换因变量。结果表明贸易冲击显著提高了众议院限制贸易候选人的胜率及其与支持贸易候选人的得票差。第二，为避免部分特殊行业的大量需求主导美国自中国进口的增长，导致美国内部需求冲击的内生性担忧，本文分别剔除计算机行业、住房建设和装饰投入行业，重新构造贸易冲击指数和其工具变量，结果依旧保持稳健。第三，排除选区重新划分的影响，结果依旧保持稳健。第四，采用动态贸易倾向指数替换固定贸易倾向指数判定每个选区内每次选举时限制贸易候选人样本，重新回归，结果依旧保持稳健。^①

(三) 异质性分析

首先，鉴于中美贸易冲击对美国选举的影响程度在不同意识形态的选区可能存在差异，本文依据 Berry et al.(1998)测量的民众意识形态将选区分为自由派、中间派和保守派，结果显示民众意识形态自由的选区，限制贸易候选人因贸易冲击而获益。

^① 稳健性检验部分的具体分析及结果详见附录 II。

其次,考虑到限制贸易候选人的选票竞争在非摇摆州、摇摆州受贸易冲击的影响可能存在异质性,本文将样本分为摇摆州和非摇摆州,结果显示来自中国的贸易冲击对摇摆州限制贸易候选人的选票影响不显著,但对非摇摆州限制贸易候选人的选民支持有显著正向影响。

目前,全世界促进女性参政采用最广泛的是配额制,性别配额可以促进女性立法者参与立法决策。将候选议员样本分为男性和女性候选人的子样本,结果显示随着贸易冲击的增大,限制贸易的男性候选人所收到的选民支持显著提升,而女性候选人则无明显变化。

最后,如上文所述众议院每2年即进行换届选举,候选人连任压力较大,因此将样本分为在任候选议员和非在任候选议员,实证结果显示在贸易冲击下,在任候选议员受益于限制贸易的态度,得到了更多选民支持,而非在任议员则无明显影响。^①

五、进一步拓展分析

(一) 限制贸易议员的投票行为

本节将采用断点回归的方法进一步探讨限制贸易候选人胜选后对贸易法案及再分配法案的投票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1. 贸易法案、再分配法案的筛选

贸易类法案投票数据来源于 Voteview 数据库,包含每个法案在每个选区的投票结果。贸易类议案划分标准同上,本文通过人工判断样本期内的贸易法案是支持贸易还是反对贸易。综合考虑每个选区每个任期内的支持自由贸易法案投票的比例作为本节实证分析的因变量。再分配法案与贸易关系紧密,尽管反对自由贸易、提高贸易壁垒可以保护当地选民免受贸易冲击的进一步损害,但是对于已经承受贸易冲击造成福利损失的选民而言,再分配法案的通过对其更有意义。所以,假设候选议员通过限制贸易的态度获取贸易冲击下选民的支持,那么其也会倾向于支持再分配法案的通过赢得一定的选票。再分配类议案划分标准参考 Rohde/PIPC Roll Call Project^② 分类下的 962 编码。综合考虑每个选区每个任期内的支持再分配法案投票的比例作为本节实证分析的另一因变量。

2. 识别策略

本文选取样本期内美国众议院议员对于贸易法案和再分配法案的投票结

^① 异质性分析部分的具体分析及结果详见附录Ⅲ。

^② 该数据对众议院法案表决类型进行编码,用于研究国会议员投票行为、党派极化和政治制度。

果作为因变量,利用限制贸易候选人与支持贸易候选人的得票差额做断点回归,以证实限制贸易候选人胜选后在断点处对贸易法案或再分配法案的态度存在跳跃,模型设定如下:

$$Pro_{dt} = \beta_0 + \beta_{RD} Ganti_{dt} + \epsilon_{dt}, \quad (7)$$

其中, Pro_{dt} 为第 t 年选区 d 议员支持贸易议案或再分配议案的投票比例^①。 $Ganti_{dt}$ 表示第 t 年选区 d 限制贸易候选议员胜选的虚拟变量,若限制贸易候选人胜选,则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 ϵ_{dt} 为随机扰动项。参考 Feigenbaum and Hall(2015),因变量支持贸易议案或再分配议案的投票比例计算方式如下:

$$Pro_{dt} = \frac{\sum I\{Vote_{dbt} \times BillType_b > 0\}}{\sum |Vote_{dbt}|}, \quad (8)$$

分子中 $Vote_{dbt}$ 表示 t 年胜选议员在选区 d 内对贸易法案 b 的投票结果,赞成为 1,反对为 -1。 $BillType_b$ 表示贸易法案 b 的类型,若为支持自由贸易的法案,则为 1,否则为 -1。分子包含示性函数 I ,只有当 $Vote_{dbt} \times BillType_b$ 大于 0,即表示胜选议员对贸易法案 b 的投票结果显示其为支持贸易时才会计数并在此基础上加和。分母表示胜选议员在 t 年选区 d 内对贸易法案投票次数的总和。因此 Pro_{dt} 即代表 t 年选区 d 内胜选议员支持贸易议案的投票比例。类似地,我们也可以得出 t 年选区 d 内胜选议员支持再分配议案的投票比例。

接下来定义驱动变量 $Margin_{dt}$,详见式(9)。 $Votes_{dt}^{ganti}$ 为 t 年选区 d 限制贸易候选人的得票率, $Votes_{dt}^{support}$ 为 t 年选区 d 支持贸易候选人的得票率。若驱动变量 $Margin_{dt} > 0$,则说明 t 年选区 d 限制贸易候选人胜选,否则支持贸易候选人胜选。

$$Margin_{dt} = Votes_{dt}^{ganti} - Votes_{dt}^{support}. \quad (9)$$

虽然候选人可以通过演讲、募捐等方式影响选票,但是候选人无法完全操纵选民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胜出或者败选的带宽足够小,我们可以认为一个选区的限制贸易候选人是否胜出是随机决定的,进而我们可以利用该特性来实现限制贸易候选人行为的因果推断。图 1 直观给出了限制贸易候选人和支持贸易候选人在断点处的投票分布。在截断处左边,驱动变量小于 0 即支持贸易候选人胜选,右边驱动变量大于 0 即限制贸易候选人胜选,截断处胜选议员由支持贸易议员变为限制贸易议员,同时对贸易法案和再分配法案的态度出现跳跃。我们基于这一跳跃采用断点回归进行相关因果推断。

^① 本处分析单位是议员,由于仅有胜选议员才可以对议案进行投票,因此议员和选区是一一对应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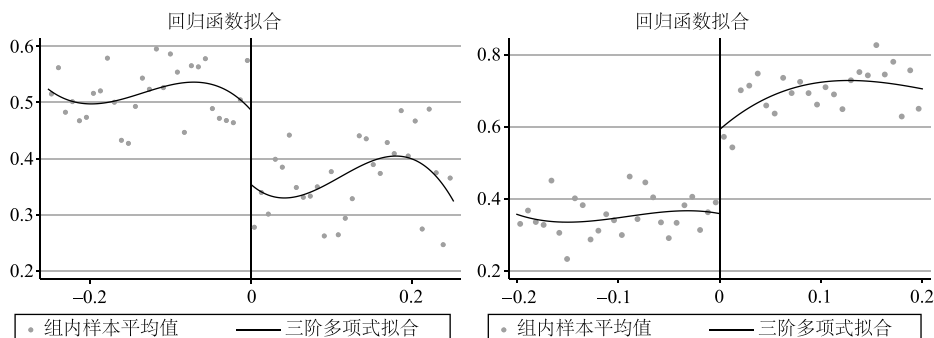


图1 限制贸易议员和支持贸易议员在断点处的投票分布

注：左图纵坐标为贸易法案投票，右边纵坐标为再分配法案投票。

根据 Hahn et al. (2001), $Margin_{dt}$ 在 m 处连续, 具体回归系数由下式可得:

$$\widehat{\beta_{RD}} = \frac{\lim_{m \downarrow 0} E[y_{dt} | Margin_{dt} = m] - \lim_{m \uparrow 0} E[y_{dt} | Margin_{dt} = m]}{\lim_{m \downarrow 0} E[Ganti_{dt} | Margin_{dt} = m] - \lim_{m \uparrow 0} E[Ganti_{dt} | Margin_{dt} = m]} \quad (10)$$

上述模型可以采用参数方法和非参数方法对 β_{RD} 进行估计, 参数方法中我们采用三阶多项式, 非参数方法则采用局部线性估计 (Imbens and Kalyanaraman, 2012)。标准误均聚类到驱动变量层面。不同于传统探讨党派影响的文献, 民主党与共和党的得票率比较因第三党派的存在并不完全决定当选候选人, 而此处驱动变量的正负可以确定地决定限制贸易候选人的当选, 即清晰断点回归 (Sharp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Sharp RD)。

尽管断点回归 (RD) 近似于可控实验, 但其隐含的假设是驱动变量在断点处是平滑且不受干扰因素影响的。为检验驱动变量及其映射因变量的平滑性, 我们参考 McCrary (2008) 在断点处进行连续性检验。如图 2 所示, 横轴表示限制贸易候选人与支持贸易候选人的得票差异, 断点处代表差额为 0, 断点左侧限制贸易候选人与支持贸易候选人的得票差为负, 代表支持贸易的候选人胜选, 反之断点右侧表示限制贸易候选人胜选。连续性检验系数为 -0.084, 标准差为 0.126, 统计上不显著, 故限制贸易候选人与支持贸易候选人的得票差在断点处不存在显著差异, 符合断点回归的前提假设。

表 4 中 Panel A 采用的是三阶参数方法, Panel B 采用的是非参数方法, 其中第 (1)—(3) 列的因变量是支持贸易法案的投票比例, 第 (4)—(6) 列的因变量是支持再分配法案的投票比例, 按照全样本期和根据选区重新划分为两个子样

本得到实证结果。^① 首先对贸易法案支持比例进行断点回归,根据 Panel A 第(1)—(3)列显示,在断点处限制贸易议员对待贸易法案的态度相对负面,整个样本期内限制贸易议员对贸易法案的支持比例较支持贸易议员低 0.19,并在 1%水平上显著,说明两者对贸易法案的态度存在显著差异,限制贸易议员显然更反对自由贸易。分样本的结果也显示出相较于 1992—2000 年,2002—2010 年限制贸易议员对自由贸易的支持度更低。Panel B 第(1)—(3)列的实证结果也与 Panel A 相似,整个样本期内限制贸易议员对贸易法案的支持比例较支持贸易议员低 0.20,并在 1%水平上显著。分样本的结果显示 1992—2000 年,相较于支持贸易的候选人当选,限制贸易候选人当选后对自由贸易的支持度低 0.10,并在 5%水平上显著,而 2002—2010 年限制贸易的议员对自由贸易法案的支持度低 0.35,在 1%水平上显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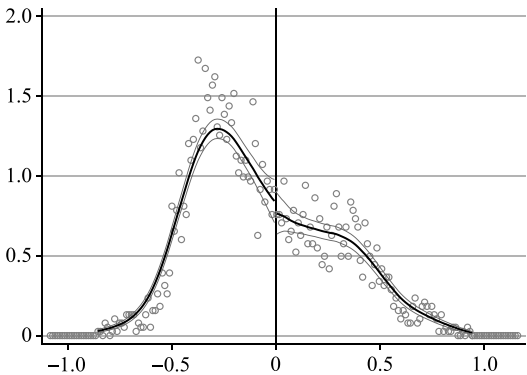


图 2 McCrary 连续性检验

表 4 贸易倾向指数对得票差的断点回归

	支持贸易法案的投票比例			支持再分配法案的投票比例		
	1992— 2010 年	1992— 2000 年	2002— 2010 年	1992— 2010 年	1992— 2000 年	2002— 2010 年
	(1)	(2)	(3)	(4)	(5)	(6)
Panel A: 参数方法						
限制贸易候选人	-0.187*** (0.034)	-0.057 (0.039)	-0.353*** (0.056)	0.281*** (0.042)	0.227*** (0.049)	0.419*** (0.069)
观测数	3 331	1 748	1 583	3 329	1 747	1 582

① 表 4 基于横截面回归,附录Ⅳ还给出了控制州层面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基本保持一致。

(续表)

	支持贸易法案的投票比例			支持再分配法案的投票比例		
	1992— 2010 年	1992— 2000 年	2002— 2010 年	1992— 2010 年	1992— 2000 年	2002— 2010 年
	(1)	(2)	(3)	(4)	(5)	(6)
Panel B: 非参数方法						
限制贸易候选人	-0.198*** (0.033)	-0.095** (0.045)	-0.353*** (0.050)	0.259*** (0.046)	0.200*** (0.051)	0.410*** (0.064)
最优带宽	0.252	0.175	0.289	0.201	0.222	0.271
观测数	3 331	1 748	1 583	3 329	1 747	1 582

注：第(1)—(3)列的因变量为支持贸易法案的投票比例，第(4)—(6)列的因变量为支持再分配法案的投票比例。*、**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聚类到驱动变量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其次，对再分配法案支持比例进行断点回归。表 4 中 Panel A 第(4)—(6)列显示，在断点处，较支持贸易候选人而言，限制贸易候选人当选对再分配法案的支持比例显著提高。全样本期内，限制贸易议员对再分配法案支持比例提高了 0.28，1992—2000 年内提高 0.23，2002—2010 年提高 0.42，并且均在 1%水平上显著。根据 Panel B 第(4)—(6)列，非参回归的结果与 Panel A 保持一致，限制贸易议员较支持贸易议员显著支持再分配法案，全样本期内支持度高 0.26，1992—2000 年支持度高 0.20，2002—2010 年支持度高 0.41，均在 1%水平上显著。如上文所述，限制贸易议员为了获取因遭受贸易冲击带来福利损失的选民支持，不仅反对自由贸易，也倾向于支持再分配法案，援助因国际贸易受损的部分选民。

最后，为更加直观地展示 RD 回归结果，图 1 给出限制贸易议员和支持贸易议员在断点处的投票分布。左图纵坐标是支持贸易法案的投票比例，可见相较于支持贸易候选人，限制贸易候选人当选后对自由贸易法案的态度有向下的跳跃；右图纵坐标是支持再分配法案的投票比例，可见限制贸易候选人当选后对再分配法案的态度有向上的跳跃。图 1 的结果与表 4 保持一致。

(二) 政府转移支付的研究

上述基准结果的可能原因是美国部分制造业工人受损导致的(Autor et al., 2013)。然而，国际贸易在提高社会福利和经济发展上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在国际贸易中受到损害的某些群体，政府可以采取一定的政府转移支付进行相应的补贴，帮助从业者再就业，从而使贸易在总体上对国家产生有利影响。考

考虑到美国 1962 年通过的《贸易扩展法》中包含贸易调整援助计划,其目的是为因国际贸易遭受失业或收入下降的劳动者提供再就业培训和补贴,本节考察贸易调整援助计划是否会影响选民对限制贸易候选议员的支持力度,相关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Y_{idt} = \beta_0 + \beta_1 Exposure_{dt} + \beta_2 Subsidy_{dt} + \beta_3 Exposure_{dt} \times \beta_2 Subsidy_{dt} + X'_{dt}\gamma + \delta_s + \eta_t + \epsilon_{idt}. \quad (11)$$

较式(5)不同之处在于式(11)加入第 t 年选区 d 接受贸易调整援助计划的测度 $Subsidy_{dt}$ 以及其与贸易冲击指数的交互项,其余变量与上文保持一致,不再赘述。第 t 年选区 d 接受贸易调整援助计划的测度分别采用该选区当期受贸易援助的人数占劳动力总数、就业人数的比例,实证结果如表 5 第(1)—(2)列所示。结果显示贸易援助计划显著削弱了贸易冲击下美国选民对限制贸易的候选议员的支持力度,有利于改善候选议员对自由贸易的支持。贸易援助计划对收到贸易冲击的劳动力进行补贴、培训,有助于他们渡过困境,快速实现再就业,从而相对于未参与贸易调整援助计划的失业者而言,他们对待自由贸易的态度更积极。议员由选民选举,贸易援助计划缓解了议员为了胜选而策略性采取反对自由贸易的压力,使得他们能够从长远利益出发支持自由贸易,而非为短期的选举利益而放弃国际贸易所带来的福利及经济发展。

表 5 贸易调整援助计划的调节效应

变量名	限制贸易候选人得票率	
	(1)	(2)
贸易冲击指数	4.996*** (1.258)	4.970*** (1.254)
贸易冲击指数×贸易援助	-3.984** (1.949)	-3.625** (1.790)
贸易援助	2.315 (2.048)	2.177 (1.893)
选区层面控制变量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州层面固定效应	是	是
观测数	3 335	3 335
R ²	0.183	0.183

注:表 5 的因变量为限制贸易候选人的得票率,每列均控制贸易冲击指数、贸易援助、贸易冲击指数×贸易援助的交互项、选区层面的控制变量、年份固定效应及州层面固定效应。*、**和*** 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聚类到州-年份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六、政策建议

本文的政策建议如下：第一，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崛起下，我国政府和企业应提前做好应对准备，采取有效措施减轻外部贸易政策变动带来的不确定性和潜在损失，促进中国产业结构升级。面对当前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和外贸形势的严峻挑战，我国需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战略有助于增强内需、稳定经济增长，并提升我国在全球经济中的话语权。第二，我国应进一步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在与其他国家的互动中，不仅可以增进相互理解、减少对中国崛起的误解，还能帮助世界各国更全面、客观地认识中国，进而推动建立更加稳固的国际关系，确保各方利益的平衡与共享。

参考文献

- [1] Autor, D. H., D. Dorn, and G. H. Hanson, "The China Syndrome: Local Labor Market Effects of Import Competi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3, 103(6), 2121-2168.
- [2] Autor, D. H., D. Dorn, and G. H. Hanson, "When Work Disappears: Manufacturing Decline and the falling Marriage Market Value of Young Me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Insights*, 2019, 1(2), 161-178.
- [3] Autor, D. H., D. Dorn, G. H. Hanson, and K. Majlesi, "Importing Political Polarization? The Electoral Consequences of Rising Trade Exposur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20, 110(10), 3139-3183.
- [4] Baldwin, R. E., and C. S. Magee, "Is Trade Policy for Sale? Congressional Voting on Recent Trade Bills", *Public Choice*, 2000, 105(1), 79-101.
- [5] Barro, R. J., "Inequality and Growth in a Panel of Countries",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2000, 5, 5-32.
- [6] Berry, W. D., E. J. Ringquist, R. C. Fording, and R. L. Hanson, "Measuring Citizen and Government Ideology in the American States, 1960-93",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98, 327-348.
- [7] Bonica, A., "Ideology and Interests in the Political Marketplac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13, 57(2), 294-311.
- [8] Bonica, A., "Mapping the Ideological Marketplac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14, 58(2), 367-386.
- [9] Bonica, A., Database on Ideology, Money in Politics, and Elections: Public Version 3.1 [Computer fil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Libraries. <<http://data.stanford.edu/dime>>, 2023.
- [10] Che, Y., Y. Lu, J. R. Pierce, P. K. Schott, and Z. Tao, "Did Trade Liberalization with China Influence US Election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22, 139, 103652.
- [11] Che, Y., and R. Xiao, "Import Competition, Fast-track Authority and US Policy Toward China",

-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20, 48(4), 974-996.
- [12] Choi, J., I. Kuziemko, E. Washington, and G. Wright, "Loc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Effects of Trade Deals: Evidence from NAFT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24, 114(6), 1540-1575.
- [13] Conconi, P., G. Facchini, and M. Zanardi, "Fast-track Authority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Negotiations",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Economic Policy*, 2012, 4(3), 146-189.
- [14] Feenstra, R. C., H. Ma, and Y. Xu, "US Exports and Employmen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9, 120, 46-58.
- [15] Feenstra, R. C., and D. E. Weinstein, "Globalization, Markups, and US Welfar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17, 125(4), 1040-1074.
- [16] Feigenbaum, J. J., and A. B. Hall, "How Legislators Respond to Localized Economic Shocks: Evidence from Chinese Import Competition",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2015, 77(4), 1012-1030.
- [17] Hahn, J., P. Todd, and W. Van der Klaauw, "Identification and Estimation of Treatment Effects with a Regression-discontinuity Design", *Econometrica*, 2001, 69(1), 201-209.
- [18] Hall, A. B., and J. M. Snyder Jr., "Candidate Ideology and Electoral Success", *Stanford University*, 2015.
- [19] Imbens, G., and K. Kalyanaraman, "Optimal Bandwidth Choice for the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Estimator",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12, 79(3), 933-959.
- [20] Knoll, K., M. Schularick, and T. Steger, "No Price Like Home: Global House Prices, 1870-2012",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7, 107(2), 331-353.
- [21] Lewis, J. B., B. DeVine, L. Pitcher, and K. C. Martis, "Digital Boundary Definitions of U.S. Congressional Districts, 1789-2012", [Data file and code book]. Retrieved from <http://cdmaps.polisci.ucla.edu> on [date of download], 2013.
- [22] Lewis, J. B., K. Poole, H. Rosenthal, A. Boche, A. Rudkin, and L. Sonnet, Voteview: Congressional Roll-Call Votes Database. <https://voteview.com/>, 2021.
- [23] Margalit, Y., "Costly Jobs: Trade-related Layoffs, Government Compensation, and Voting in US Election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11, 105(1), 166-188.
- [24] Margalit, Y., "Political Responses to Economic Shock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019, 22(1), 277-295.
- [25] McCrary, J., "Manipulation of The Running Variable in the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 A Density Test",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2008, 142(2), 698-714.
- [26] Pierce, J. R., and P. K. Schott, "The Surprisingly Swift Decline of US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6, 106(7), 1632-1662.
- [27] 王孝松, "特朗普的贸易政策立场及中美贸易发展前景展望", 《中国工业经济》, 2017 年第 6 期, 第 57 页。
- [28] 谢丹阳、程坤, "包容性全球化探析", 《中国工业经济》, 2017 年第 6 期, 第 13—19 页。

China-US Trade and Voter Support for US House Candidates Advocating Trade Restrictions

CHE Yi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YU Jinqiu*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ZHANG Yan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bstract: We attempt to explore how US-China trade issues influence both China's development and US elections, using US trade bill voting and political donation data. We find that trade shocks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vote share of trade-restrictive candidates for the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their winning probability, and the vote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and pro-trade candidates. A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analysis shows trade-restrictive candidates are elected to be more opposed to free trade bills and in favor of redistribution bills. However, US government transfer policies help reduce voter support for protectionism.

Keywords: China-US trade; trade restriction; vote share

JEL Classification: F51, F68, F16

* Corresponding Author: LYU Jinqiu, Antai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Xuhui District, Shanghai 200030, China; Tel: 86-18271392762; E-mail: lj_q_sjtu@sjtu.edu.cn.